

凭窗读史



老舍(中)和茅盾(左)、于群(右)在重庆。

抗战岁月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老舍先生生命中承受最重的篇章,其作品是中华民族在炮火、恐惧、奔波、饥饿、失望、痛苦、希望中应运而生的信念之作、生命之歌。

笔作枪炮墨为弹

当卢沟桥的炮声撕碎北平夜空时,老舍的《大明湖》《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才相继问世不久。那时,他已目睹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带来的满目疮痍,在作品中反映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北平上空突然被战争弥漫的硝烟遮盖,老舍听见胡同里传来逃难者的哭嚎,看见城墙上飘起刺眼的太阳旗,这位以京味文字见长的作家,此刻胸腔里翻涌的不再是北平胡同的家长里短,而是黄河壶口瀑布般奔突的愤怒。他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战争不会让作家走开,笔该换一种写法,人该换一种活法了。

从英伦三岛到新加坡,从上海到济南,从武汉再到重庆北碚的茅屋,老舍的行囊里始终装着三样东西:碗、稿纸和一支洞察世事的笔。突如其来的战争,使他不得不搁置酝酿已久的《二马》续篇,思绪转而飞回他熟悉的北平小羊圈胡同,他看到祁家四代人在小羊圈胡同里经历焚心之痛——钱默吟从诗人变成复仇者,祁瑞全冲出沦陷区参加游击队,就连最懦弱、最胆小、最窝囊的祁瑞丰,也在寇寇的汉奸嘴脸前露出一丝人性的挣扎。他看到战争阴霾下的北平苍生,没有金戈铁马的壮阔,却有千万人在“惶惑”中坚守,在“偷生”中觉醒的迷茫。他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我要写出北平人的骨头,哪怕它被碾成粉末,也该带着城砖的坚硬。”

这种坚硬化作《火葬》里的复仇火焰,化作《国家至上》里回回同胞的携手御敌,更化作无数篇鼓词、快板和街头剧。在重庆防空洞的油灯下,他学着写“数来宝”,把“汉奸卖国”编进韵脚;在伤兵医院的病床前,他用《新刺虎》的故事点燃战士们的斗志。有人劝他“莫失文人风骨”,他却指着窗外逃难的妇孺笑道:“风骨若不能佑佑生民,不如化作街头的呐喊。”彼时的老舍,笔是枪杆,墨是弹丸,每一个字都带着硝烟的温度,砸向侵略者的狼子野心。

振臂为旗聚文坛

1938年的武汉,长江边的码头挤满了流亡的知识分子。当老舍与郭沫若、茅盾等人聚在一间破



老舍和宋之的合著的剧本《国家至上》。

庙里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抗敌文协”)时,窗外正飘着细雨,如同整个民族的血泪。老舍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这个听起来像“账房先生”的职务,实则是“文协”的“总舵手”。没有经费,他揣着空口袋去见冯玉祥将军,用一段自编的相声换来了募捐;没有场地,他把自己屋子让出来作为会议室,让南来北往的文人在八仙桌前讨论剧本;有人闹矛盾,他揣着两斤烧酒上门调解,酒过三巡便拍着桌子说:“国难当头,谁再窝里斗,就是给鬼子递刀子!”

在老舍先生的奔波努力下,“抗敌文协”成了散落在各地文人的精神堡垒。他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让巴金、曹禺的笔触到前线的战壕;他开办通俗文艺讲习班,教乡村教师写抗战小调,让太行山的窑洞里流传出《放下你的鞭子》;他推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使《新华日报》的副刊成了士兵们的“精神干粮”。有记者问他为何如此奔波,他指着协会墙上“团结御侮”四个大字说:“一根筷子易折,一捆筷子难断。文艺界拧成一股绳,就能顶得上支方面军。”那些年,他的衣衫上总沾着风尘,皮鞋底磨出了洞,却让“抗敌文协”的旗帜插遍了大后方的城镇乡野。

茅盾在文章中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地顺利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方,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

马海龙

风骨如碑照千秋

重庆北碚的茅屋漏雨时,老舍正在写《四世同堂》里祁老人被日军殴打的那段文字。雨水打湿了稿纸,晕开的墨迹像老人脸上的血污,他索性赤着脚站在泥地上写,任凭寒雨浇透脊梁。妻子胡絮青送来棉衣,见他笔下的文字带着哭腔,劝他歇歇,他却摇头:“我冷,北平的百姓更冷;我难,流亡的同胞更难。这篇稿子多写一行,或许就能多暖一个人的心。”

这种共情让他的作品注满了对苍生大众的温情。《四世同堂》以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为背景,以小羊圈胡同内祁家四代人的生活为主线,展现了社会各阶层在战争中的命运沉浮。全书分为《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刻画了从忍辱偷生到觉醒反抗的民众群像,成为抗战时期史诗性作品。《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在忠与孝之间撕扯的普通人,他为了照顾老父幼子不能奔赴前线,却用教学生读《史记》的方式传递民族气节。老舍懂得,抗战不仅是战场厮杀,更是每个灵魂在抉择中的淬炼。就像他自己,放弃安稳的创作环境,选择在炮火中颠沛,用文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担当奔赴国难。

1945年8月,重庆的报童在街上高喊“日本投降了”,老舍正给“抗敌文协”的同仁写感谢信。他放下笔,走到窗前,看见满城的灯火像星星落在人间。那一刻,他再次想起了北平的胡同,想起了小羊圈胡同里升起的国旗,想起那些在笔下死去的人物——他们没能等到胜利,但他们的坚守,早已化作民族精神里的钙质。

八十年的今天,当我们重读《四世同堂》,依然能触摸到老舍先生的心跳。那支在战火中磨秃的笔,不仅记录了一个民族的苦难,更写下了永不屈服的誓言。它警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等来的礼物,而是无数人用信念与风骨铸就的长城。老舍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文人,从来不是时代的旁观者,而是在风暴中挺立的大树,根深扎在泥土里,枝叶向着光明不断生长。

这株在抗战岁月里倔强生长的大树,如今已亭亭如盖。我们正站在它的浓荫下,重温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起捍卫和平的磅礴力量,共护人类共同家园。

赵一曼的“示儿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陈列着一位母亲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她就是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英雄——赵一曼。

黄埔毕业的女战士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参加革命后用名李一超,在东北从事抗日斗争时化名赵一曼。

1905年,赵一曼出生于四川宜宾,自幼崇拜英雄,立志做女中豪杰。她在大姐夫郑佑之(四川早期中共党员)的影响和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并于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青年时期的赵一曼爱好读书、写作,极具文学才情,曾在《女星》《妇女周报》《合力周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控诉不满、向封建势力宣战,逐步转向维护女权、寻求社会变革。1926年11月,赵一曼被迫转入宜宾中山中学读书,开学那天适逢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她有感而发,在《宜宾中山中学开校记》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先生为革命,为革命奋斗,为奋斗牺牲。现在先生死了……谁能继续先生的精神奋斗呢?谁能照先生这样的不怕牺牲呢?”可见,21岁的赵一曼已经抱定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

1927年2月,赵一曼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成为中国革命第一代女兵。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培养革命干部,1927年9月,党组织决定派赵一曼等具有革命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她同行的还有任弼时妻子陈琼英之兄陈达邦,两人后来在苏联结为夫妻。

不久之后,根据国内革命工作需要,党组织要求赵一曼回国。已怀有身孕的赵一曼克服一切困难,于1928年11月回到上海。1929年2月,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一个男孩,取乳名“宁儿”。

此后,赵一曼辗转于各地从事地下工作。因带着孩子行动不便,孩子也无法得到很好的照料,于是,1930年4月,在上海征得小姑子陈琼英的同意后,赵一曼将年幼的孩子送到汉口,托付给陈达邦的堂兄陈岳云抚养,并留下一张合影,从此母子二人再也没有相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反帝救国斗争,决定派一批干部去东北工作,赵一曼由此踏上了东北征程,先后在沈阳、哈尔滨进行党的地下工作。

在哈尔滨工作期间,赵一曼经常与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同志接触,她自己有时也写些文艺作品,在地下刊物《工人事业》上发表。她曾有一首题为《滨江日述》的旧体诗,充满了革命的豪情:“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4年,赵一曼来到哈尔滨东南山区的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市)抗日游击区,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在发动群众、建设和保卫珠河根据地、支援游击队打击敌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春,县委决定派赵一曼任铁北区委书记,她深入滨绥铁路北段林乡一带,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在当地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这支队伍越战越强,后改编成地方游击连,有时配合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部队作战。同年秋天,赵一曼领导的这支游击连编入三军一师二团,赵一曼担任团政委。

在军队中,赵一曼是文武双全的指挥,率领部队在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兵力,同时也十分关心爱护战士。由于根据地被敌人破坏,部队生活艰苦,休息时的赵一曼会一边给战士们缝补衣服,一边与大家



赵一曼与儿子宁儿合影。

谈心,讲述革命斗争故事,鼓舞大家的斗志。战士们都尊敬且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

人们把她和骁勇善战的赵尚志将军相提并论,称为“哈东二赵”。“身穿红装,骑上白马,跨过山林,飞驰平原,宛如密林的女王。”——从当时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对她的描述中,我们仿佛也能看到赵一曼昔日的飒爽英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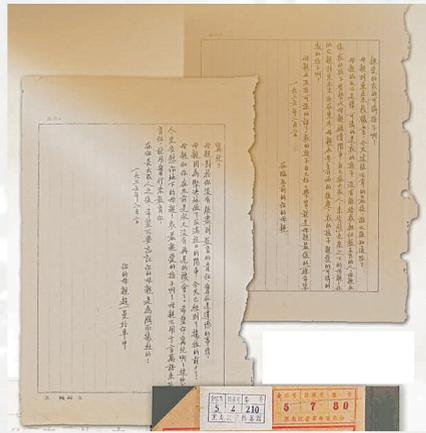
两封绝笔信

1935年11月,在一场抗击日寇的激烈战斗中,为了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交战过程中受伤昏迷而被俘。

当时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野野泰治对赵一曼进行了连夜审讯。据大野的文章回忆,身负重伤的赵一曼“从容地抬起头来”,“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令他“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面对折磨,赵一曼始终对党组织的机密守口如瓶,她编造假口供迷惑敌人;27岁,出生于江苏徐州,家境富裕,受过高等教育,和丈夫一起到东北做买卖,丈夫因进行抗日活动被枪决……

当大野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时,她忍着伤痛,义正辞严地痛斥道:“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民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她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把敌人对她的审讯变成了她对日军的审判。

为了得到重要情报,1935年12月,日军将生命垂危的赵一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在医院里,



赵一曼两封绝笔信卷片。

她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揭露日军的罪恶行径。她的豪气和勇气赢得了医院警士董宪勋和护士韩凤义的尊敬和同情,并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逃出医院,但不幸很快被日军再度抓捕,被关押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今东北烈士纪念馆)。就是在这里,赵一曼受到日伪警察灭绝人性的摧残。一个月后,在一无所获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敌人决定把赵一曼押解到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决示众。

在被押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平静地要来纸和笔,写下了最想对儿子说的话,即文章开头的那封遗书。

在写完这份遗言后,她想到敌人也许会拿着她的遗言作为口实,去迫害她的孩子。于是,她又写了一份与之前编造的口供一致的遗书(目前看到的两份遗书均根据伪档案的记录誊录形成):“……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你的父亲到东北来死在东北,母亲也步着他的后尘……”

生命的最后时刻,赵一曼昂首挺胸,愤怒地对敌人的枪口,用年仅31岁的年轻生命实现了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开始查访离散家属。四川的李坤杰也在寻找外出参加革命的妹妹李坤泰。经多方打听,1954年8月,李坤杰通过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曾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证实,自己的妹妹李坤泰,李一超就是抗日英雄赵一曼。后来,李坤杰还通过陈琼英找到妹夫陈达邦和外甥陈振赞(宁儿),割舍不断的亲情被延续。当陈达邦得知自己的妻子就是电影《赵一曼》原型时,更增怀念和敬爱之情。当陈振赞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妈妈时,倍增对母亲的思念和崇敬,他曾于上世纪50年代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含泪手抄了一份母亲留给他的那份遗言。现在,这封跨越多个世纪的革命家书由赵一曼的孙女陈红留存。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赵一曼为民族战斗、牺牲的英雄气概,激励着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赵骄健